

郭慧娟的研究利用了大量的保留在荷蘭和印尼的VOC檔案資料，也利用了大量的荷蘭文與英文的二手資料，因此能夠詳細地重建18世紀後期爪哇東北地區的政經歷史。透過四個利益集團的分析，根據賽局（game）和勢力結合（synergy）的觀念，她生動地、很有說服力地描述了這段罕為人知的爪哇歷史，在歷史視野的廣度和深度兩方面作出極重要的貢獻。

由於VOC資料的性質，這本書所論述的對象局限於當時爪哇東北的政治與經濟菁英階層，讀者很難看出在她所描述的政經發展中，廣大的平民到底受惠或受害。我們不禁要好奇地問：在這半個世紀裡，爪哇東北的經濟到底有沒有成長？如果是肯定的，扣除菁英階層的利益，一般人民的福利是增加或倒退？也就是，如果經濟的餅是被做大了，一般平民是否與利益集團分享了更多的餅？

另外一個問題是：VOC的政經運作是否打擊了在地人民的商業勢力？學界普遍認為爪哇人的商業勢力與企業能力從此衰落下去，大部份被華商取代。作者似乎不太認同這種看法，但綜觀全書的論述，這種看法並沒有被否定，反而得到加強。

近代早期華商在東印度群島的經貿勢力發展，我們所知仍然十分有限。文獻不足徵，我們很難突破這個知識的障礙。作者利用VOC檔案的紀錄，總算在這方面獲得了突破性的成果，雖然當時華商實際運作的細節還是無法得知。最近爪哇巴城公館的《公案簿》的整理與出版多少有點幫助，但是我猜測VOC的檔案還是最大的寶庫，還有更多的紀錄可以透露有用的信息。

在觀念架構、研究方法和資料使用上，這本書都有發人深省的成就。對於VOC時代東印度群島的政經歷史，以及當時的華人經貿歷史，這是一本必需閱讀的書。

張彬村

臺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劉正剛，《東渡西進——清代閩粵移民臺灣與四川的比較》，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410頁。

中國移民史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又頗具難度的研究領域。首先，移民史牽涉到歷史學、語言學、人類學、歷史地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知識與方法。其次，中國歷史悠久、幅員廣闊，人口眾多，地域差異千姿百態、族群關係極其複雜，移民情況往往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呈現出不同的面

相，難以把握。復次，一項好的移民史研究，必須把移民問題置入廣闊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與把握，這就要求研究者具備較好的通史、斷代史以及相關地域史的知識。最後，相關歷史文獻特別是明清以來的文獻浩如烟海，一方面難以窮盡（目前某些較有影響的移民史研究，其實在資料上就存在很大問題），另一方面，任何一位稍有經驗的研究者都會發現，關於數據資料、制度運作細節等等方面，現有資料要麼未加記載，要麼歧義甚大，要麼就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因此，如果不滿足於拼湊材料進行淺層次的過程描述以及似是而非的定量分析，研究者就不得不面臨着諸多令人頭疼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目前學界雖然已有一些關於中國移民史的較高水平論著，但值得拓展的空間仍然非常巨大。例如，城市與鄉村、海外與內地、自發與政府強制等不同類型的移民，其所蘊含着的社會經濟與文化方面的意義與性質往往有較大差異，如果對之進行深入比較研究，會為我們開闢出一些理解中國移民史的新視角嗎？會揭示出一些我們平常不曾注意但並非無關緊要的面相嗎？劉正剛的新作《東渡西進——清代閩粵移民臺灣與四川的比較》便是試圖在這個方面做出貢獻的著作。

《東渡西進》是楊國楨主編的「十五」國家重點圖書——「海洋中國與世界」叢書的一種，作者以清代閩粵人移民臺灣與四川為研究對象，更大的抱負是想比較（向）內陸移民與（向）海洋移民的異同。全書共分七章，並沒有按時間序列展開，而是每章圍繞一個專題來論述。

第一章「朝野關注東西部」，作者根據詳實的資料指出，朝廷支持和鼓勵移民四川，移民政策基本連續不斷。但對待移民臺灣，朝廷的政策卻相對消極、保守，而且移民政策反復不定。作者從地理位置、開發程度、財政意義、國家安全等角度分析了清王朝對待四川與臺灣的不同移民政策的原因，並進一步揭示不同政策所導致的移民進程與規模方面的差異。前往四川的移民規模大，來源地廣泛，而且主要以家庭或家族的形式遷移；前往臺灣的移民則規模相對較小，基本來自閩粵兩省，而且早期主要以單身男性偷渡為主。國家的移民政策、歷史傳統影響移民遷入地歷史的展開方式，是本書一個核心的觀點。以後各章中所論述的移民四川和臺灣的差異，往往都與此相關。

第二章「血濃於水聚親情」，主要論述移民的家族組織與地緣組織。像許多研究者一樣，作者也敏銳意識到，由於閩粵人移民臺灣以不完整家庭移民方式為主，移民宗族關係的建立也相對滯後，並援引莊英章的研究說明臺灣先有地域關係，而後才出現宗族關係。宗族的具體發展過程則先有合同式

宗族，祭祀「唐山祖」，後有闖分字宗族，祭祀「開臺祖」。與此相反，在國家的支持下，移民四川往往以舉家甚至舉（家）族的形式進行，因此宗族關係的建立比臺灣早，也更健全。四川宗族關係大致有共同奉祀「入川主」以及共同奉祀閩粵始祖兩種類型，隨着時間推移，前者變得更為突出。接着，作者又討論了編修族譜、歸葬與墳墓問題。與臺灣移民社會將先人骨骸移入祖籍安葬相反，四川的閩粵移民一開始或在極短時間內就將先人骨骸移入四川安葬，臺灣移民與祖籍地的關係也比四川移民與祖籍地之間的關係密切，顯示出移民對四川的加強較為迅速。

第三章「鄉音未改凝鄉情」，主要討論地名、會館、演戲、民間信仰等，作者試圖抓住「故土地域意識」這一關鍵，貫穿起這些看似分散的問題，考察移民社會如何組織與整合起來。因為空間距離遠近對故土的地域認同感的影響的差異，臺灣移民地緣組織大都以故鄉的縣級政區為單位構建，四川則主要以故鄉的省級政區為單位建立。移入地的地名不但帶有故鄉的影子，並且通過對故鄉神明的供奉，移民凝聚起了共同的情感。在移民建立的地緣組織過程中，會館也起了重要作用，晚清以後，四川、臺灣移民地緣組織多重神靈信仰實現混合化，移民不分彼此，相互祭祀不同地緣的神靈，說明移民之間的界限開始逐漸彌合，預示着移民社會逐漸轉入了定居社會。

第四章「生財有道顯特色」，分析移民對四川、臺灣的開發。作者指出，由於歷史與地理的差異，四川屬於恢復性開發，包括盡量恢復其原有的社會制度。而臺灣則屬新開發區，移民須建立一整套社會制度。這就導致兩地在開墾路綫、開墾方法、租佃模式、農業發展方向和組織方式等方面的差異。因為移民要向「土著」租佃土地，因此臺灣一田兩主現象普遍存在，而四川以小農經濟為主的模式，到嘉慶以後才逐漸改變。與此相應，清代四川移民社會一直凸現着中國傳統社會以自然經濟為主的耕織結合制，直到近代外國及本國機制紗布輸入才走向解體，而耕織結合模式在臺灣卻從未形成氣候，臺灣農業中，商品經濟佔有主導地位。商業方面，臺灣主要通過海洋與大陸沿海進行貿易，鴉片戰爭後更進一步與世界市場聯為一體，島內區域分工也很清楚，明顯具有楊國楨所提出的「海洋性特徵」。四川則主要通過江河或內陸與大陸各地市場以及西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貿易，帶有典型的內陸性商業特色。

第五章「接觸、衝突與融合」，圍繞移民與「土著」居民由接觸到衝突再到融合的過程以及官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描述了移民與開發所帶來的族群問題。臺灣土著居民與漢族移民接觸的歷史較短促，因利益紛爭而使矛

盾比較突出。四川移民開始接觸的是當地漢族居民和他省移民，然後再與少數民族接觸，且漢族與非漢族在四川接觸的歷史較悠久，雙方已比較了解，因此關係總體上顯得較為融洽。

第六章「節慶歡娛皆雀躍」，主要討論臺灣與四川移民的文化娛樂方式、內容及功能等。儘管凝聚共識、聯絡感情、提供商機是兩地文化娛樂活動的共有特點，但作為老開發區的四川的酬神演戲等活動一方面是四川本地文化的弘揚，另一方面則是各省移民文化在四川的展示，內容和形式的社會娛樂性極強；而臺灣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播主要是通過閩粵移民進行的，更多具有閩粵地方文化的色彩，其酬神演戲活動的內容也多體現為人神溝通，抗擊自然災害、社會控制和自我管理的目的較明顯。與此相應，官府對待四川的娛樂雖然限制，但是基本上是與民同樂，對待臺灣則以限制性措施為主。

最後一章「移民大潮中的另類」，作者比較了橫行不法、分別影響臺灣和四川社會穩定的兩類無業游民——「羅漢腳」與「啞嚕」，以及官方的因應措施。隨着乾隆以後流動人口遽增，臺灣「羅漢腳」數量亦大增，道光以後，由於政府「收募游民」、「化莠為良」等政策的實行，才使得「羅漢腳」數量有所減少。雖然四川的「啞嚕」與臺灣的「羅漢腳」均是有組織的團夥作案，但前者更具組織性、紀律性和隱蔽性，更帶有典型的民間秘密結社性質，成為了清政府重點打擊的對象。

劉正剛對閩粵移民的研究始自攻讀碩士學位期間，迄今已有近20年，1997年還出版了《閩粵客家人在四川》一書，《東渡西進》可謂作者多年潛心研究之作，其價值自不待言。該書史料豐富，對許多材料的解讀也顯示出作者較好的功力（如對「照單」的分析），圍繞國家政策與歷史傳統來分析移民，亦可謂抓住了問題的主要關鍵點之一。當然，正如本文開頭所指出的，移民史研究是一個頗具難度的領域，研究者面臨着諸多不易解決的困難，對此作者亦有清醒的認識，在「致讀者（其實相當於整本書的導言）」中就坦言因為資料的缺漏，有些章節只能籠統地描述內陸四川移民社會的特徵。

因為所研究對象的特點，作者還面臨着另一個重大挑戰，會館、宗族、神廟、民間信仰等都是國際學術界的熱門話題，目前已有許多高水平的論著。此外，在海峽兩岸以及外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目前無論資料的搜集整理、學術理念、學科對話、研究方法、已有成果等等方面，臺灣史研究都堪稱中國區域史研究的典範。如何消化、吸收相關成果並有所推進，本書尚有進一步發揮的空間。作者採取內陸與海島移民比較的新視角，其實已為這種

推進提供了一種思路。如果本書能多一章內容豐富的「結語」，把正文中可能已經隱含但尚未直接點明的突破更爲深刻地揭示出來，凸現出本比較研究的學理所在，其學術價值無疑會更上一層樓，希望作者在再版時能夠考慮筆者的這一淺見。

溫春來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JOSEPH P. MCDERMOT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xiv, 294 pp.**

本書題爲《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圖書和文人文化》，作者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通過考察1000—1800年間中國書籍的生產、流通和消費情況，探討從宋代到清中期中國在印刷技術、知識獲取和文人身份認同等領域發生的重要變化。本書把社會學的視角和方法引入古籍研究，從而有別於傳統的版本目錄之學。

全書分爲六章。導論部份以一個特殊的故事開啓了對800年書籍史的探索：18世紀的蘇州補鞋匠錢進仁，因爲酷愛藏書和讀書而受到地方學者的尊敬。雖然他終身貧困潦倒，沒有功名，也沒有著作流傳，甚至沒有任何風雅的愛好，死後卻以「文人」的身份被埋入虎丘，並由當時著名的學者汪縉撰寫碑文。作者展示了書籍和知識在古代中國的巨大魅力，表面看來，他並不亞於進入菁英文化圈子的憑證。究竟是什麼給中國書籍賦予了這樣大的權力？古人對書籍的痴迷到底是單純的個人興趣還是有着更深層的社會原因？爲了論述的集中，作者在下文中選取了江南地區和文人階層作爲分析對象。

第一、二章主要討論中國書籍的印刷史。第一章分析雕版印刷爲什麼會成爲中國圖書的主要出版方式。由於文人不屑於記錄，工匠不願意分享行業內的秘密，有關古代雕版印刷情況的文獻資料異常匱乏。作者採用英國傳教士William Milne（1785—1822）在19世紀對中國印刷情況所撰寫的調查報告，指出因爲工具簡單，對工人的技術要求低，木版佔空間小、易於保存，雕版印刷成本低廉，從而成爲中國書籍最主要的印刷方式。在第二章中，作者認爲，雖然雕版印刷盛行，但並沒有妨礙抄本的廣泛流傳。一方面是心理因素，古代文人對抄本的書法美學情有獨鍾，並把抄書奉爲最理想的閱讀方式；另一方面出於現實需要：大量的史書和詩文集不在刻印之列。作者舉出